



談朱熹與佛教的關係

智銘

在宋明理學家，反佛最烈的人，以朱熹為第一，只要看看他註解的論語，就可證明，但朱熹之學，得力於佛學者也最深。胡適先生將朱熹幼年與佛教的關係，也曾作了一番考證。

明初，會稽的心泰和尚曾編撰了一部「佛法金湯編」，共十卷（續藏所收萬曆重刻本為十六卷），書成於洪武十九年（西一三八六）。書中有洪武二十四年（西一三九一）宗泐、清濬、守仁諸序。有洪武二十六年（西一三九三）蘇伯衡序。這部書是收錄佛教外護的敘傳，文字謹嚴，各傳引文，皆著其來源。書中尤累引「資鑑」。所謂「資鑑」，即是元末閩僧熙仲所編的「釋氏資鑑」，共十二卷，也被收在續藏經中。

「佛法金湯編」卷十五，有朱熹傳，記朱熹早年與禪宗的關係，尤其是與開善寺道謙禪師的關係。其中有云：

公（指朱熹）少年不樂讀詩文，因聽一尊宿說禪，直指本與內心，遂悟昭昭靈靈一著。

十八歲請舉，時從劉屏山，屏山意其留心學業，暨搜其篋，只大慧禪師語錄一帙耳。（註：劉屏山就是劉子翬，又號病翁）。

有久雨齋居誦經詩（見「朱文公文集」）曰：

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

暫息塵塵牽 超然與道俱

公嘗致書於開善道謙禪師云：

「向蒙妙喜（即大慧宗杲禪師）開示：「應是從前記持文字，心識計校，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，但以狗子無佛

性話，時時提撕。」云云。願受一語，警所不逮。」

師答曰：

「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，只為遲疑，後忽知非，勇猛直前，便自一刀兩斷，把這一念提撕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（趙）州云：無！」不要穿鑿，不要去知見，不要強承當。」

公有省。

宗杲是道謙之師，常勸人參趙州「狗子無佛性」的話頭。道謙則教朱熹如何去參。朱熹因而「有省」。

宗杲於紹興十一年（西一一四一）住在徑山，被「毀衣牒，竄衡州。」這時的朱熹只有十二歲。至二十一年始量移梅州，朱熹已二十一歲了。朱熹與道謙通信，約在十五六歲時，胡先生認為：「未必與宗杲（應是道謙）通信，上兩件通信，都是宗門套語，未必可信。」朱熹十五六歲是否有可能與道謙通信，後面當為引證，但朱熹少年時即與禪宗發生了因緣關係，應是不會錯的。

「佛法金湯編」中的朱熹傳，從「釋氏資鑑」中，引用了一段朱熹祭道謙文：

師（指道謙）卒，公（指朱熹）祭以文，畧曰：

「我曾從學，讀易、語、孟，究觀古人之所以聖，既不自揆。欲造其風，道絕徑塞，卒莫能通，下從長者，問所當務，皆告之言：「要得契悟。開悟之說，不出於禪。」我於是時，則願學焉。師出仙州，我寓潭上，一嶺

間之，但有瞻仰。丙寅（即紹興十六年〔西一一四六〕朱熹十七歲）之秋，師來拱辰（岩名），乃獲從容，笑語日親。一日焚香，請問此事，師則有言：「決定不是。」始知平生，浪自苦辛。去道日遠，無所問津。未及一年，師以謗去，我以行役，不得安住。往還之間，見師者三。見必致留，朝夕咨參。師亦喜我，為說禪病。我亦感師，恨不速證。別其三月，中秋一書，已非手筆，知疾可虞。前日僧來，為欲往見，我喜作書，曰此良便。書已遺矣，僕夫過言：同舟之人，告以訃傳。我驚始呼，問何以故？嗚呼痛哉，何奪之遽？恭惟我師，具正偏知，惟我未悟，一莫能窺。揮金辦供，泣於靈位，稽首如空，超諸一切（資鑑末四句失韻，似有刪節）。

這段祭文，充份說明了朱熹少年與道謙禪師交往的經過，與二人密切的關係。胡先生認為這篇祭文「文字明白樸素，可能是朱熹早年的文字。」既然如此，前段所述朱熹寫信與道謙討論「狗子有無佛性」就是真實的事，而不是宗門的「套語」了。祭文中，朱熹稱道謙為「我師」，可見朱熹對道謙是如何的尊敬，受道謙的教誨，影響是多麼的深。要不然，朱熹怎會焚香請益呢？朱熹後師事於李侗，李侗寫了一封信給羅博文（羅從彥之姪孫），信上說：

元晦（指朱熹）進學甚力，樂善畏義，吾黨鮮有。……渠初從謙（道謙）開善處下工夫來，故皆就裏面體認。今既論難，見儒者絡脉，極能指其差誤之處。自羅先生「豫章——羅從彥」來，未見有如此者。（見葉公同「朱子年譜」八葉。王懋竑「朱子年譜」上——二——二三葉，也引舊譜載的此書。張伯行刻的「李延年先生文集」一，也收此書。）

由這封信，可以確實證明朱熹會從建寧開善寺的道謙禪師學法。但道謙死後，他就沒有這股熱情去焚香向其他的大善知識請益，而一心在儒家學說中「進學」。朱熹在祭道謙的文中，已自己說明「惟我未悟，一莫能窺。」因為他未能窺到佛家的究竟，

所知者僅是佛家的表層，所以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一點「絡脉」以後，就反過頭來與佛家「論難」並「極能指其差誤之處。」殊不知儒家所講的，是入世之學，佛家所講的，是出世之學，以入世的觀點來指責出世的「差誤」，在方法與基礎上就錯了。設若朱熹當年能有所悟，能窺到佛法的究竟，或者繼續請益於大善知識，將佛學弄通之後，再回過頭來潛心儒學，並詮釋論語，其境界或更高，所倡說的理學當更充實了。

「朱子語彙」一〇四——輔廣錄，有這樣一段自述：

某，年十五六歲時，亦嘗留心於禪。一日，在病翁（劉子翬字彥冲號病翁）所，會一僧，與之語，其僧只相應和了說，也不說是、不是。却與劉先生說，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。劉後說與某，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。遂去叩問他，見他說得也煞好。及去赴試時（紹興十八年〔西一一四八〕他十九歲時），便用他意思去胡說。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。試官為某說動了，遂得舉。

輔廣錄是「甲寅以後所聞」，「甲寅」是紹熙五年（西一一九四），朱熹已六十五歲了。胡適先生認為：「六十五歲的人，談十五六歲的故事，還說的這樣親切，當時朱子大概曾說出開善道謙的名字（語錄百廿六——葉二八，提到道謙的話），輔廣錄已不知道五十年前的那位禪門大師了（或是有意不說道謙之名），只說是「一僧」，以年歲考之，此僧即道謙，似無可疑。」

朱熹自述的這段話，其中的「一僧」，經胡先生考證即是道謙禪師。經一次叩問，在應試時，不用其師劉子翬平日的教誨，而用「一僧」的「胡說」去「粗說」，竟能說動試官，因而得舉。可見「一僧」的一席話，比朱熹老師多年教誨更有用。試官的被「說動」，非被朱熹所說動，而是被「一僧」所說動。朱熹的得舉，非朱熹的成就，而是「一僧」的成就。由這段自述中，可見朱熹受佛教熏陶的關係，對其後來的為學，影響是多麼重大。

胡先生又在元僧熙仲編的「歷代釋氏資鑑」裏，看到朱熹早年與禪宗和尚往來的事，其中特別提到朱熹與建寧府開善寺道謙和尚的師弟關係。胡先生認為：這些資料是道學（下轉第26頁）

形，決定在農曆年底看完全部敦煌膠卷，結束我的工作。美國的社會制度，每週工作五天，週末與週日，都是休假，圖書館也不例外。每天我是九點半才去乘車，到了圖書館已是十點鐘了，下午四時三刻又要趕去搭車，再扣除中午吃飯及休息的時間，每天最多只能看到六小時的膠卷。爲了提早結束我的工作，必須設法爭取更多的時間看敦煌膠卷。我去長島三個月之後，才知道圖書館的楊太太，住在華盛頓過去的那條路上，楊太太每天上班下班，也走25 A公路，華盛頓路口是她必經之處。因此，我跟楊太太商量，希望能夠搭乘她的便車，提早到圖書館，看敦煌膠卷。楊

（上接第19頁 談朱熹與佛教的關係）
家（理學家）傳記裏向來有心諱避的，或者無意中忽畧的。而這些資料，又正是治思想史的人所最感興趣的。

在「釋氏資鑑」中，有這樣一段話：

朱文公嘗與學者言：釋氏有清草堂者，有名叢林間，其始學時，若無所入，有告之（草堂禪師嘗告之）曰：「子不見貓之捕鼠乎？四足踞地，首尾一直，目睛不瞬，心無他念，惟其不動，動則鼠無所逃矣，請用其言，乃有所入。」彼之所學，雖與吾異，然其所以得之者，則無彼此之殊。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。

「釋氏資鑑」所記的這一條，也被記入「朱文公集」七十一「偶談漫記」裏。胡先生考證朱熹引的這段話，原出於宗杲的「宗門武庫」。而這本書又是道謙編次的。朱熹既會就益於道謙，當然讀過這本書，因此在以後教導門人時，即以宗杲教佛家弟子修行的方法而教他自己的弟子們。可見朱熹不但思想、舉業得益於佛學，甚至教育法也是學自佛家的。

學佛家的理法，來闡揚儒學，而又用儒家的入世，來攻訐佛家的出世，這差不多是宋、明理學家們一貫的做法，研究了朱熹與佛教的關係以後，更能證明這一點。

七〇年九月三〇日寫於淨室

太太告訴我，她每週只能帶我六次（早晚各三次），其他的日子，她將另有事情。搭乘人家的便車，當然視人家的方便爲主，不能強求。楊太太每週能夠帶我三天，每天可以早到圖書館多看一小時的敦煌膠卷，這樣，每週可以多看三個小時的卷子，對我而言，非常重要。逢到楊太太能夠帶我的日子，我在八點三刻就到華盛頓路口等她，和她一起上班，下午五點，也跟她一同下班，一同回去。每次回去的時候，承蒙楊太太的好意，一直送我到菩提精舍，免得我走那段十多分鐘的寒冷夜路，而後她再開車回家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（上接第40頁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）

程度，但是我仍在不停自修之中，我也將不揣淺陋，繼續以淺薄的智識來寫隨筆，當然不少是講錯的，詒笑大方。可是，假如大家都怕講錯而不敢講，豈非更不好？哪怕人家笑我穿鑿附會，我也還是要講的，只因我已經知道佛法是通往宇宙永恆之路，我希望普及地使人人都接觸佛法，脫出疾苦生死，我只懂淺的，就講淺的吧！

話再說回頭，我說，不錯，土星的光環，峨眉金頂佛光，捨身崖下佛光，都是大自然的，分析下去，都不外是原子電子核子，電磁作用之類。但是，在宇宙中的一切，在多度空間之中，有一種無色無形無相的原動力在推動一切，那就是佛，就是大智慧，有人稱爲「上帝」，有人稱之爲「造物主」，其實都是佛，都是佛的大智慧！我們要找尋這種超智慧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皆可從學佛途徑進入三昧，回到宇宙中不生不滅的永恆，成爲宇宙智慧的汪洋之一點滴，那些佛光是爲了接引，才出現的，並非無因而現。

紫色光焰，人人皆有，却須勤求佛法，才煉成金色佛光！

（完）